

# “存在”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 ——对当下中国哲学语境中存在问题的解读

赵丽琼

(银川能源学院 宁夏 银川 750105)

**[摘要]**“存在”是中国哲学中最常用的词，“存在”一词的哲学话语成为中国哲学话语平台的主要角色，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存在”的哲学理论，但没有对这个西方语言中使用的词进行分类，“存在”是什么意思？它背后隐藏着什么历史文化意义？如何进入哲学语境？这些问题，再加上哲学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和哲学叙事中“元”的强化，因此，“存在”已经成为一个“问题”，需要从“存在”的意义及历史语境中梳理这些问题，明确哲学叙事中的语义环境，从而对“存在”做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 中国哲学；存在；知识论；历史语境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7.197

### 引言

近年来，“存在”一词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出现的频率明显提升。“存在”一词的哲学话语已成为中国哲学话语平台的主要角色，有人试图用“存在”的思想框架重构“当代中国哲学”，有人试图用“存在”重构“当代中国哲学”，有些人试图用“生存”来重建当代哲学的命运，有些哲学理论则以“存在”问题为出发点作为梳理西方哲学历史逻辑的重点，也有人从存在问题的角度解读中国传统哲学，也有人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本体论”和“存在主义”，在当代中国哲学语境中，“存在”已成为一个“问题”，它以“问题”的方式影响哲学神经，可以称之为“分析当前中国哲学叙事中”。

#### 1. 从语词使用的常识经验来看

“存在”因不同的语境而有不同的含义，“看”与“摸”作为判定物体存在的标准。经验之谈表明能够看到及摸到东西即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只是状态的表达，这里常用作形容词或副词。这里的“存在”仅指“存在”事物。在日常经验的“存在”语境中，“存在”一词以“现实”的形式表达。“存在”形式出现，“存在”被视为“客体”的认知思维方式所隐藏。这里，“存在”的语法属性是名词的用法，“存在”的意义类似于“真实的事物”“客体”及“物质”。在对认识论进行客观理解后，在“智慧哲学”的语境中，“存在”的意义可以表述为“存在”本身，即从“存在”到“存在”本身，这里用“存在”一词来表达“存在”本身，这只是为了叙述方便，且“存在”的意义超出了“表达”的范围<sup>[1]</sup>。

#### 2. 中国人哲学记忆中的刻板映像

作为一个问题，“存在”不仅来源于哲学教科书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即“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存在”一词被视为“思维”的对立范畴，仅在认识论中使用。“本体论”的含义源于现代哲学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传统教材中思维与本体的关系。事实上“存在是一种感知”，而“现实”的意义被提升到意识世界中，虽然有一些看似“科学”的东西，但仍然离不开认识论的意义及辩证法，因此，很难摆脱认识论的悖论。然而，问题的存在不仅体现在一个词的力量上，也不单是认识论对事物状态的描述。事实上，存在本身存在于生活中，通过哲学、宗教、艺术等描写手段，揭示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存在”一词指的是“存在本身”或“存在”。能够进入到现实生活世界中，摆脱了传统教材中认识论的重要性<sup>[2]</sup>。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诗意栖居”的描述打破了以往哲

学对“梦”的“清晰阐释”。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当代西方学术界要从“存在”中消解现代性，就必须掀起一股反思哲学教科书的浪潮。现象学、存在主义、海德格尔哲学等西方大陆文化使我们开始思考如何解构“存在”的本义，在认识论上，这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可以说，“存在”的哲学意义已经超越了作为“基本哲学问题”的认识论范畴的结构意义，“存在”作为问题在今天的意义，实际上是反映了社会生存状态及意义<sup>[3]</sup>。

#### 3. “存在”是如何成为问题的

换言之，我们如何看待“存在”和“存在”这两个词，当我们谈论“存在”时，通常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我们会认为“存在”是可见的、可接近的和真实的。第二，这种“存在”是由“看”和“摸”的“真实存在”决定的吗？当人们也可以问“是与不是”的时候，这表明他并不认为它是真实的，“存在”可能是一种幻觉。这些人会寻找真实的“存在”。人们需要找到确立“存在”信仰的标准“真实存在”。人类有一种自然倾向，即“理性”。可以说，“理性”是人们相信理性是真实存在的基础。“理性”既有逻辑意义，也有道德意义，是认识论也是心理学。这意味着判断“理性”的标准可以从多个角度制定。通过对这种纯粹意识形态经验的分析，可以确定“理性”的标准从多维视角看，“存在”与“问题”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鸿沟，由于感官经验的不确定性，基于感官经验的判断是不可靠的，因此应明确合理的“标准追求”。然而，在众多具体的“理性”标准中，多样性而非唯一性表明，逻辑、历史、传统和大多数人的选择并不是决定“理性”的唯一标准。因此，以这种方式确立的“存在”意义上的“信仰”既不真实，也不根本。因此，人们必须为确定“存在”找到一个无可争辩的基础。

对存在本身的思考取决于对存在的思考。这里的“依赖”不是对象性的外在反映，而是“存在”中的“思考”。西方哲学中“我思故我在”的深刻内涵是可以实现的。在广义逻辑意义上，当“存在行为”由于思维的逻辑惯性形成了一种必然的观点，所以仍然存在着“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存在的可能性”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在这个问题上的乌托邦空间不是一般哲学逻辑所能达到的观点。它需要更深刻、更难描述的宗教愿景<sup>[4]</sup>。

从“存在就是问题”的思想体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就是存在”的信念不仅是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也是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分析可以使人相信“存在”的方式，这

与人们在思想和经验上对“存在”的可能理解是一致的。这就是“看”和“摸”相一致的是科学理性和经验思维方式下的“存在”信念，这与“理性”和“理性”相一致。“解决之道在于人们相信科学理性的必然性。除了理性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合理存在”的缺失，根据逻辑的不完备性，我们创造的思维体验只是促进叙述，“准备”本身是不确定的<sup>[5]</sup>。

#### 4. “存在”作为发问方式呈现为不同的问题

所谓“问题”的原因是“怀疑”，因此，问题是如何解决“信任”问题，“提问”就是获取“信息”；信息是我们对“为什么”的认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根据思维习惯，我们总是问“为什么？”因为我们并不总是相信它。我们怎么能相信他是否喜欢它？“为什么我应该相信？”这需要一些基本的方法来使“信念”成为可能。这些问题往往遵循我们的思维逻辑。一般来说，“信念”是对上述观点进行实证分析时各种“信念”标准的复杂重叠。在一定条件下，在现实生活的历史中，有三种情况：一是靠感觉体验，通常是历史传统的产物，因为它是文化传统的继承。它包含了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可靠”信念，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先人前辈所世代相传的事情。二是根据我们目前的感受。俗话说，“看”和“摸”是可靠的。三是根据理性逻辑，这也是“信念”。换句话说，逻辑思维的长期惯性，理性思考“理性”背后的“身份”控制着强烈的思考和暴力。为什么我们相信历史传统？为什么我应该相信“看”和“摸”的个人感觉？为什么相信理性逻辑的力量？这是传统历史经验积累的结果“看”和“摸”的实践经验的理性逻辑，它构成了我们和我们国家的基本生活方式，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存在”，真正将“信仰”转化为“存在”超越了传统历史经验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和理性逻辑。因此，“存在”“存在”本身和意义是“信仰”的基础，所以我们相信，从这个角度看，“信”问题的背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我们存在的意义<sup>[6]</sup>。

#### 5. 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语境来看

对“存在”状态经历了两次反省和质疑，正是在这种反省和质疑中，我们的“存在”变成了一个“问题”。一是把传统文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信仰”的问题；二是近30年来“思想解放运动”引导下的“改革开放”，使人们从概念化的“知识分子”思维中觉醒，发现我们所依赖的“存在”只是一个刚性的概念体，我们必须寻找我们原来的“无前提”<sup>[7]</sup>。

这两种思维方式及其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为什么相信”的困惑，可以说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表明，在纲常亲情伦理规范下，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失去了信心。我们可以在“中西融合”“打倒孔家店”等文化口号中看到这一点，这表明，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存状态和传统文化是否是在过去两千年的精神混乱中形成的，这种精神障碍的历史后果是2000多年的传统文化和遗产建设瞬间崩溃。我们从先秦文人的文化传统、汉儒经典、魏晋玄学、隋唐佛教、宋明清儒学和新儒学开始。这种精神困惑的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

因此，“文化之我在哪儿”，“文化之我是谁”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题，在晚清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与对话”的背景下，这一主题反映的是思想文化，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对话”它是由中西不同形式的对抗所形成的，也是解释这一历史“存在”的逻辑根源。当我们走出与道德信仰密切相关的“乡土中

国”时，根据“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信仰是什么”和“基础是什么”变成了一个似乎没有解的方程式。有些人想从当地的道德和情感中回到他们的旧梦想中，另一些人则必须面对广阔的荒野，寻找新的出路。回首我们的“中国”已经被摧毁。我们不能回到这个地方吗？这是我们的家吗？这充满了关于“存在”的问题。展望未来人们仍然不知道“新”之路将何去何从，出于对“新”的渴望，我们在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中寻找“信仰”存在的原因<sup>[8]</sup>。

这种令人信服的“礼乐文化”传统已经被“理性”的概念所取代，因为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体现在“科学”和“民主”上。因此，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够通过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资本生产力及其对社会物质生活的影响来体现，是因此从“科学”精神出发，崇尚实践理性的人不能依赖“科学”的理性，理性与我们原有的实践理性的心理积淀是一致的。因此，在科学理性的影响下，一切基于科学理性的思想都表现出对现代性的依赖，我们成了“科学”精神的囚徒，但由于中国传统道德所形成的地方道德意识，在社会道德积淀的背景下，民主社会的契约理性在社会心理面前是脆弱的，这就是我们的状态。正是在“存在”的状态下，理性被用来选择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即“存在”，从“存在”的科学理性延伸来看，它必然以认识论主体的形式出现。作为理性认识的思维主体，我们接受“存在”的概念<sup>[9]</sup>。

#### 结束语

因此，当“存在”与“思维”是一个哲学范畴时，所探寻的“存在”问题就不再是存在本身，而“存在”只是一个相对的思维范畴哲学意义是康德的“经验主义”中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哲学思维中，通常将“存在”理解为概念，作为认识论思维的主题。在这种思考中，存在的问题只能是概念简述。

#### 参考文献

- [1] 郑开. 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本体论与形而上学[J]. 哲学研究, 2018(01): 77-85+128.
  - [2] 路传颂. 汉语哲学界关于本体论与本体的误解[J]. 江西社会科学, 2019, 39(03): 24-30.
  - [3] 刘君莉. 汉语哲学语境中“形而上学”之三重含义及其检讨[J]. 科学经济社会, 2019, 37(03): 6-10.
  - [4] 黄斌. 政治的生命哲学语境——以官本位为例[J]. 现代交际, 2019(16): 240+239.
  - [5] 李弦, 王让新. 现代哲学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J]. 广西社会科学, 2019(10): 76-81.
  - [6] 杨维敏. 马克思“人本质”与中国哲学语境下“人性”概念辨析[J]. 吕梁教育学院学报, 2020, 37(04): 45-46+51.
  - [7] 宫敬才. 论马克思《巴黎手稿》写作的思想资源问题[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6(05): 46-53.
  - [8] 田冠浩. 政治哲学语境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嬗变——基于对柏拉图、卢梭和马克思的考察[J]. 求是学刊, 2019, 46(06): 26-33.
  - [9] 段忠桥. 政治哲学、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与吴晓明教授商榷[J]. 社会科学辑刊, 2020(04): 28-38+2.
- 作者简介:  
赵丽琼, 1986年7月, 回族, 黑龙江, 本科, 助教, 银川能源学院。